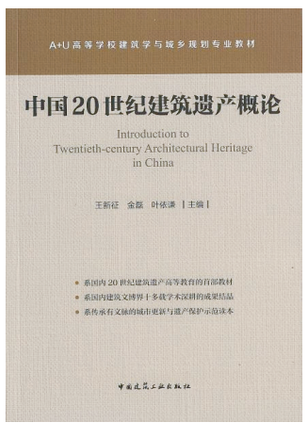
《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概论》的五个特点

金磊



积20年学术积淀及十余年潜心研究与实践，《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概论》（以下简称《概论》）正式出版。7月16日，新书首发暨20世纪遗产教育研讨座谈会在北京举办，与会专家围绕教材编写、学科建设、遗产保护与人才培养展开交流。作为本书策划及主编之一，笔者有诸多感悟交流如下。

首先要提及的是，《概论》的出版策划是建立在20世纪建筑遗产多项成果基础之上的。成果之一是《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年度报告（2014—2024）》（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等主编，天津大学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该书细数20世纪遗产项目并优选40余项示范案例，呈现近90位专家的理念“随笔”。成果之二是《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论纲》（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马国馨、金磊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该书归纳整理了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学科建设的理论进展，呈现了20多位资深建筑师、文博专家对20世纪建筑遗产的综合论述，力在探求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模式与方案。成果之三是《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建筑师》（马国馨、金磊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该书系统展现了为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作出贡献的75位建筑师与工程师的风貌，旨在发挥中国建筑师的世界影响力。

其次，要谈谈这本《概论》的五个特点。**特点一：讲授国内外20世纪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发展脉络。**同济大学教授张松提出，20世纪形成的城乡建成环境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岁月痕迹，是不可再生的记忆之物。《概论》梳理了相关国际宪章对20世纪建筑遗产的重视与保护。从1975年10月欧洲建筑遗产大会通过的《阿姆斯特丹宣言》，到1989年12月在维也纳召开的“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与促进战略”研讨会，2001年9月ICOMOS制定的“蒙特利尔行动计划”，2011年6月公布的《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方法的马德里文件（2011）》，再到2017年修订的《20世纪文化遗产保护方法》（马德里—新德里文件）。我国自2008年4月通过《20世纪遗产保护无锡建议》，同年8月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加强20世纪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2016年至2025年，在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建筑学会共同推动下，推出千项20世纪建筑遗产，20世纪建筑遗产的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日益提升。

特点二：讲授我国1900年至今20世纪建筑遗产演进规律。中国建筑在20世纪百年间所涉及的科技文化进步，不亚于中国传统建筑五千年之总和。据统计，在千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中，20世纪10至30年代的项目近300项。在“西风东渐”影响下，中国传统建筑迎来新中国建设探索期，既有以人民大会堂为代表的“国庆十大工程”，也有在技术上作出突破的首都体育馆（1968年建成）。这期间虽注重成本、强调坚固耐用，但也不乏中西合璧、类型多样化的建筑诞生。陈日飙等建筑师从地理分布、时间序列、功能分类等方面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的特征，既有本土精神探索，也有地域基因表达，既有技术材料演变，也有创作主体的变化。2000年后建成的项目中，有14项成为20世纪建筑遗产，体现出公共地标的文化生产与服务创新、原生场地和新建尝试与历史记忆的延续、国际合作的在地化与本土叙事的现代化等特点。

特点三：讲授具有城市品质的建筑遗产类型。《概论》第九章专述事件建筑遗产及其对城市的影响。事件城市是那些在20世纪产生重大影响的城市事件及与之对应的建设。诸如江苏南通，以张謇主导的“实业救国”的一系列城市现代化为主旨，既有1905年开中国文博公益先河的南通博物苑，又有“一城三镇”（老城、唐闸工业区、天生港物流区、狼山风景区）的城市格局，既有标志性建筑，也有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的规划设计。此外，会堂建筑遗产、文博建筑遗产、高校建筑遗产、商业建筑遗产、科技建筑遗产等都丰富着《概论》中的遗产类型。如针对高校建筑遗产，叶依谦、陈震宇、杜林东有针对性地提出这类遗产具有时代印记鲜明，苏式风格与本土融合；功能导向明确，适配教学科研核心需求；形态标识性强，承载校园集体记忆；布局系统规整，校园环境优美等特征。《概论》还细致探讨了修缮性保护、适应性更新、再生性设计的创新转译方法。叶依谦以建成50余年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3号楼整体改造工程为例，提出了针对不同部位的历史记忆特征、空间特点和使用需求的设计改造策略。同时书中也对北京大学医学部图书馆改扩建提出设计策略，整体改造后的新图书馆展现了校园的标志性文化传承要素，成为北大医学部的精神地标。

特点四：讲授突出服务人民的20世纪建筑遗产类型。人民的建筑当属住宅与住区建筑，要充分看到居住建筑遗产保护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性保护，发展成涉及法律、社会、文化等多维度的综合型设计建造实践。以北京为例，1949年后，从集合住宅的探索到“人民公社”的福绥境大楼以及1985年开工的方庄居住区，1994年恩济里小区的试点住宅，注重挖掘地域建筑文化元素和来自基层的营造技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特性。20世纪与现当代建筑遗产中，不乏为人民服务的医疗空间与环境，这类建筑不仅有空间上的人性化细节，更在设计修缮中凸显人性化表达方式，重在延续从个人到集体的记忆，避免历史文脉的断裂。这部分内容包括舒平、孙诗萌的居住建筑遗产百年评说，也有格伦柔然从国外到国内的医疗建筑遗产案例解析。

特点五：讲授中国五代建筑师的20世纪建筑遗产贡献。《概论》以建筑学编审杨永生（1931—2012）的《中国四代建筑师》一书的代际划分，勾勒中国第一代至第四代建筑师群像，按照建筑师生辰、学业、作品及思想进行介绍。诸如以“北基泰南华盖”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作品，占到1949年前20世纪建筑遗产三分之一强，包括杨廷宝的京奉铁路沈阳总站、梁思成的北京大学女生宿舍、杨锡镠的上海百乐门舞厅等。一代代建筑师已成为“国家形象”与时代风貌的塑造者，留存至今的20世纪建筑不仅是个人创作的呈现，更是集体智慧的缩影，既体现了民族形式与现代性的融合探索，更承载着建筑师的职业信念与教育传承。

《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概论》作为21世纪第一个四分之一世纪问世的中国高校建筑遗产教材，不仅服务于中国建筑与城市遗产教育事业，更向国际建筑遗产保护界展现了中国现当代建筑研究的学术状态。它将表明，中国建筑遗产界正以跨学科之势，在保护传承利用之路上开拓创新，永葆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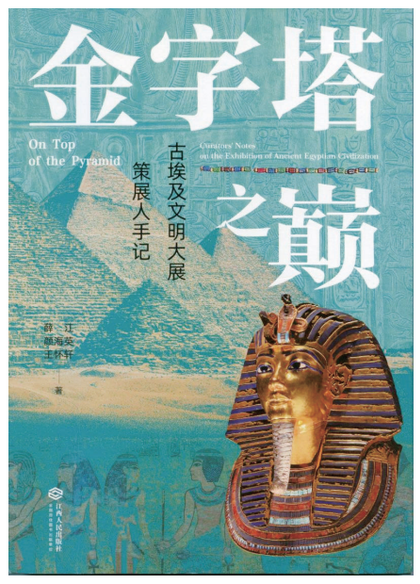
（作者单位：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专业委员会）

《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概论》
主编：王新征 金磊 叶依谦
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6月

文明互鉴 交流永固

——写在《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策展人手记》出版之际

李宝才



去年8月，“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在上海画上了圆满句号，展览带给观众的视觉冲击和痛快淋漓的文化享受却令人久久难以忘怀。笔者曾有幸身临现场，目睹了大展盛况，如今看到江西人民出版社新书《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策展人手记》时，那场现象级大展仿佛又呈现在眼前，成为“永不落幕的展览”。

本书由三位作者合著。其中，薛江先生是展览策展人，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世界艺术史研究所埃及中心负责人，担任过中埃联合萨卡拉考古中方队长，主要研究埃及艺术史与考古、埃及学、博物馆学。第二位是首席策展人颜海英女士，北京大学古代东方文明研究所所长、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世界古代史、埃及学。第三位是策展助理王怀轩先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主研埃及学。他们都是埃及学研究领域的学者。

书稿在绪言部分运用手记的叙事方式明示了“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的策展理念和背景，为诠释全书主题做出铺垫。

文明互鉴，策展之魂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最本质和最重要的属性。“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在这一理念指引下，策展人萌生了“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的策展动力。

作者认为，中华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同属人类文明史上的“原生文明”，二者虽地域悬隔、发展路径迥异，却共享“高文明”的本质共性。

两者同属大河流域诞生的农耕文明，都发展出了长期稳定的宇宙论秩序，并通过象征性的中介（法老/天子）来维系秩序。河水泛滥、季节更替等自然现象，均与王国繁荣和法老的德行紧密相连。两大文明中，统治者都是连接神圣宇宙秩序与世俗人间秩序的唯一且不可或缺的枢纽。

在“文明互鉴”语境下，策展人提出了“打破边界，构建场域、共构共情”的策展策略，通过文物选择、叙事方式、空间设计及互动体验建构，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感。

作者披露，他们通过“图词物—历史信息重构”和“熟中生—发掘明星展品”两大文物挑选策略，激活文物的双重特质，构建观众与历史对话的互动场域。为此，策展团队精心遴选带有铭文和图画的文物，结合最新研究成果，将碎片化的历史信息重新附着于物质实体之上，构建起可靠的认知基础。

展览主题将两大古文明视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巅峰，并开展互鉴与交流。第一展览板块以“法老的国度”为题，通过文物，系统阐述了史前到希腊—罗马时期跨越三千年的古埃及文明简史。第二展览板块名为“图坦卡蒙的世界”，将展览焦点从宏观文明转向微观个体，以少年法老为切入点，探索历史叙述的多元可能性。第三展览板块“萨卡拉的秘密”，透过古埃及孟菲斯地区王陵区考古，展示“一带一路”下的中埃两国联合考古最新成果，让观众体验考古研究的动态过程。

展览正是运用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遗产，搭建起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实现了两大文明间的双重对话。

构建学术话语权

埃及学是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国家创建的学科，其话语体系和研究框架都是由西方学者制定。中国埃及学的研究诞生于清末，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背景，缺少话语权和研究地位。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的改革开放为埃及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环境条件。1984年，东北师范大学成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系统研究埃及学，通过文明比较来寻找自身定位，尝试用中国视角参与国际对话，为融入全球埃及学研究主流奠定基础。

进入21世纪，全球政治经济重心转移至东亚和南亚，埃及在“阿拉伯之春”后逐渐认识到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特别是近年，“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与“文明互鉴”理念为两国埃及学研究和埃及考古项目提供了有力支持。

2022年，上海外国语大学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开展联合考古，启动埃及出土文物与文献数字化整理、材料分析专题项目，筹建大规模的古埃及文物数据库。这种以技术驱动的研究方式，确保中国考古队伍能迅速站到埃及学最前沿，建立专业声誉，同时与埃及考古队互相成就、共同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了基于古文明的埃及学及埃及考古的“内在视角”新模式，以“科技赋能、平等合作、文明互鉴”为核心，带来了从“发掘导向”到“研究导向”的方法论革命，打破了西方在该领域的长期话语垄断，标志着埃及学正式迈入多元共构的新纪元。策展团队将这种新模式作为展览的学术核心和重要内容植入展览，构建了中国在埃及学研究领域的话语权。

埃及学的研究成果

全书内容共分六章。第一章“神圣王权的诞生与发展”是对古埃及文明诞生、发展历程的诠释。

太阳和尼罗河形成的自然秩序，构建了古埃及人信仰世界的基础，创造了以法老为中心的社会秩序。在埃及国家形成的伟大历程中，各个地方的神祇都被纳入了国家的神话与宗教体系，形成了一神多形、众神一体的宏大局面。王权的确立往往伴随着各种神秘传说，于是出现了太阳神、创世神、天神等各种神明，国王法老就是神的代言人，遵命国王法老就是遵命于神。作者通过古王国时期乔赛尔梯形金字塔、吉萨三大金字塔等王陵及有关文物，来诠释古埃及文化和信仰的推动力所造就的高度发达的管理体系及和谐的等级社会。让人们理解金字塔是古埃及人太阳神崇拜与王权发展结合的产物。

第二章名为“图坦卡蒙的世界”。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卡特在埃及帝王谷发现了一座三千多年一直未被盗掘的法老墓，出土珍贵文物5000多件。墓主人是古埃及史籍里没有片言只语记录的法老——图坦卡蒙，他以短暂传奇的人生以及埋葬数千件珍宝的陵墓，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法老之一。

作者以图坦卡蒙的世界为题，带出了法老所处的新王国时期社会结构转型期的主要历史片段。第一部分概述了新王国转型的三个阶段，特别是把帝国阿蒙神的出现以及在王国的神圣地位运用大量的考古材料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解读。第二部分探究了信仰改革前的新王国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形势，着重分析了围绕阿蒙神和阿吞神背后政治集团展开的利益斗争，用阿蒙荷太普三世的圣甲虫（太阳神化身）纪念物等文物资料，说明当时的斗争情况。第三部分讲述图坦卡蒙父亲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是古埃及出现的王权与神权的第一次正面冲突。第四部分简述了埃赫那吞去世后，宗教改革终结，社会留下深重的创伤，开启了本章题目，推出了图坦卡蒙的世界。

图坦卡蒙继位后，面对宗教矛盾和社会动荡，放弃了父亲的新宗教，将都城迁回孟菲斯，回归了传统，稳定了社会，坚守了文化的连续性，演绎了变革与回归、勇气与智慧的传奇故事，展现了他对国家未来的深刻洞察与责任感。

第三章题为“社会阶层与仪式生活”。作者抽丝剥茧地剖析了古埃及人的社会阶层与仪式生活，展现了一个等级分明，金字塔形状的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的供奉诸神、崇拜祖先、王权仪式、墓葬仪式等。用出土文物伊蒙荷太普铜坐像、古王国军队指挥官马达像、帕迪亚斯之子帕卡尔孔苏的方雕、拉美斯的跪姿抱碑像和仆人磨谷物、酿啤酒、锄地像等文物资料图像传达了古埃及不同身份之间的社会等级信息。

“书吏”为智慧之神图特索庇佑，是拥有至高权力的贵族与官吏的象征，常常成为大众改变身份，提高等级地位的追求目标，因此，书吏坐像等一时间充斥整个社会，今天的人们也能通过考古文物一饱眼福，目睹这些高人一等，被赋予智慧之神的形象。

第四章名为“匠心营造”。作者系统梳理了古埃及工匠的基本情况及主要贡献，让读者从埃及的工匠精神中感受他们创造的人间奇迹。

建筑艺术是古埃及工匠贡献给人类社会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巨大的金字塔建筑、巍峨的神庙塔门、林立的巨型柱廊与高耸入云的方尖碑，都是古埃及工匠高超技艺的体现。作者以雕像为切入点，阐述了古埃及工匠创造雕像时所包含的宗教信仰、社会观念与文化内涵的设计理念和作品的风格特点，用出土的绘画作品传达古埃及人对世界的理解与感受。

第五章为“交融与再造：埃及与地中海世界”。地中海位于亚非欧三大洲交界，除古埃及，这里也是古巴比伦、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发源地。作者从大视野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交融与再造，埃及与地中海世界的讨论命题。告知读者，地中海地区的古代文明经历了多元起源的发展历程。古埃及文明的核心特征为守正与革新并存，起到了连接三大洲文明桥梁的作用。他们早期与西亚、欧洲的远程贸易，为后来的艺术、宗教、思想的跨区域传播奠定了基础。

第六章简述了古埃及人的来世信仰与永恒观念。作者认为，古埃及人心中，生命不仅是物质的存在，更是精神与灵魂的永恒之旅。从金字塔、岩凿墓中的木乃伊到壁画、浮雕表现出的现实生活，都是期望来世延续和完善今生幸福的表达。今天的大量古埃及文化遗产大多来自他们的来世信仰，包括《金字塔铭文》《亡灵书》等在内的墓葬文学，神庙、墓室浮雕、铭文、绘画，以及围绕神庙、浮雕、铭文、绘画主题描述的宗教仪式、节日庆典等，都是这种观念的反映。

该书在每章结尾处设有专题栏，将作者研究的古埃及历史、考古和文物有关的学术论文进行编附，供读者阅读。使其进一步成为近年来少见的有关古埃及历史、考古、文物展陈研究方面的力作，值得阅读、学习。

《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策展人手记》
作者：薛江 颜海英 王怀轩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3月

照片对于中国考古学史的重要性

——《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插图本）》读后

韩恩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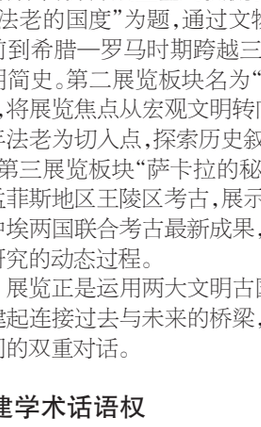
长期以来，人们述及考古学史往往是从严谨的学术研究层面，叙事多元，模式各异。以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为代表的“纪实”体，以C.W.西拉姆《神祇·坟墓·学者》为代表的“故事”体，以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为代表的“哲思”体，以孙庆伟《追迹三代》为代表的“学案”体等等。

《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插图本）》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将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在中国大陆的考古活动系统梳理，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优秀”结项的成果。十余年后再版，加入了作者购买的83幅珍贵图像及档案材料，还原了史语所考古活动的丰富细节。

考古工作包含多个工种，除研究者外，绘图、摄影、拓片等工作也是重要辅助，近些年来正逐渐被社会关注，例如2024年5月成都市青羊区专门举办了“历史的笔触——卢引科文物考古绘图成果展”，将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首席绘图师卢引科先生的大量精美线图展出。山西也曾经举办过“妙手天成——李夏廷考古绘图展、梁子明考古摄影展”等。但是将文物之外的图片大量运用在考古研究中，以往主要见于一些科普类著作或是专门的展览图录之类，与学术研究尤其是考古学史相结合还不多见，因此本书大量图片的使用在考古学史的研究中是一种突出的创新方式。

考古学传入中国之时，相机的运用已经相对成熟，因此在中国考古学史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经典照片。例如李济先生在殷墟发掘时头戴礼帽、包裹严实、手拿陶片的侧视镜头。又比如曾侯乙墓发掘过程中，墓坑内尚有积水，考古工作者涉水对编钟进行测量绘图。这些照片直观表达了考古工作的严谨、细致与不易。

在数码相机、智能手机、无人机大量运用的今天，摄影在考古工作中已经便捷许多，但这会不会导致将来我们回溯过往时，同质化越来越突出，让人印象深刻的经典照片越来越稀有？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总之，对于方兴未艾的中国考古学史叙事而言，照片的加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某种意义上也属于公共考古的创新手段。苏秉琦先生早在1950年发表的《如何使考古工作成为人民的事业》一文中就提出，“考古学是人民的学问，讲好考古学家的故事，让考古学活起来”。将照片与考古学史结合无疑是一次很好的尝试。



在内容方面，作者坦言，自己的研究重点已经不在考古学史领域，但从引用文献来看，还是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改，这对学术更新无疑有一定裨益。但也存在一些不准确之处，例如书中认为吴金鼎开创西南考古，具体来说应该是开创了史语所的西南考古工作。如果单论西南考古，吴是1938年底在大理一带调查，实际发掘工作已经到1939年。在此之前葛维汉1934年3月在广汉的发掘已经采用田野考古的操作方法，并且采用多学科的方式对出土陶片、玉器等进行科技分析。1938年暑假，已经在四川大学任教有一段时间的冯汉骥先生在川西地区开展调查，期间在汶川县雁门乡清理石棺墓一座，尽管资料直至1951年才发表，但从对后续学术研究的影响力来看，冯汉骥先生在1944年的《说文月刊》上发表《禹生石纽辨》，开启了石棺葬的研究，可能更胜一筹。

对于史语所在西南地区的活动，作者认为活动时间较长，获取的材料也不少，但成果不多，与史语所对中原地区的工作以及殷墟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有关。实际上李济先生曾经对西南考古有过战略谋划，而后来随着时局变化，前期累积的资料整理任务过重，无力深入新的研究领域，加之在西南的时间极为短暂。即便如此，据笔者所知，史语所仍有多位学者触及过西南考古材料的研究。

彭山发掘是史语所在四川的重要田野考古活动，虽然报告晚至1991年才出版，但在发掘期间及结束后不久也有不少成果，吴金鼎曾经在1943年的《图书季刊》上发表《彭山考古之重要发见》一文，指出彭山发掘有四项重要成绩：“崖洞葬制之考订”“汉代村落遗址之寻获”“花砖墓之发掘”“奇异夯土墓制之发见”，从今天的视角回溯，无疑已经关注到墓地与聚落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1946年曾昭燏写就《从彭山陶俑中所见的汉代服饰》一文，根据彭山崖墓所出陶俑研究汉代服饰，将无文字记载的陶俑形象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这一研究理路是利用无文字记载的图像（人物）与文献史料相合证，进行“图史互证”，属于美术考古的基本思路。此外，主要参加者高去寻也在1941年的《古今论衡》和1946年的《国学季刊》上发表了《崖墓中所见汉代的一种巫术》以及《汉崖墓题识“内”字之一解》等文章，考证秘戏浮雕以及陶然士当年发现的崖墓铭文等。

另外《附论一·史语所早期考古人才队伍的构成及其命运》认为，第一代与第二代考古学家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管理上实行家长制，业务上实行学徒制。实际上史语所虽然主要业务是田野发掘及资料整理研究，但也进行过正规的考古教育，甚至招收过研究生，尽管规模极为有限，却也在民国时期考古教育中留有一笔。1932年第一次招生石璋如、刘耀（尹达）即在考古组，一些学生虽未在考古组，但从其后续的学术生涯来看，应该也受到了考古学的重要影响。例如方国瑜在语言组，但在1938年底进入云南通志馆工作后，参与了《新纂云南通志》的纂修及审定，“金石”是他负责的重要内容，其后续的学术论著中也大量涉及文物考古资料，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史语所培养的成果。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

《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插图本）》
作者：陈洪波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9月

五至八版责编：郭晓蓉 张梓杰 张 宸

广告
